

“互联网+教育”时代 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转型

鲍娟,王正青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摘要:“互联网+教育”是以创新发展和改革开放为驱动力,以互联网新兴技术整合教育内外维度,推动教育颠覆性发展的一种教育新形态。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中国比较教育学迎来了学科的转型:研究目的强调服务本国教育与推动世界教育发展并重,研究对象从“大国中心”转向“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并重,研究方法强调“互联网+”背景下的比较性思维与视野,人才培养注重数据分析能力和国际教育交流能力。

关键词:“互联网+”;比较教育学;学科挑战;学科转型;学科自信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7)04-0016-07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教育信息化战略的核心主题,翻转课堂、慕课、创课、智慧学校等新兴信息化教学应用模式,吸引着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决策者以及实践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聚焦于整合信息技术发展与教育领域改革,推动教育创新发展^[1]。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制定“互联网+”计划,即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2]。同年11月,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了“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指出:“要把握‘互联网+’潮流,通过开放共享教育、科技资源,为创客、众创等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教育服务。”^[3]2017年2月,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指出:“应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国务院有关‘一带一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信息惠民、宽带中国、网络扶贫等重大战略的任务安排,实现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的核心目标。”^[4]由此可见,“互联网+”不仅可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发展,也会给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作为以增进跨文化理解与搭建国际教育交流平台为目标的比较教育学,如何迎接“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实现学科转型、建立学科自信,是本文主要关注的议题。

一、“互联网+”与“互联网+教育”的内涵界定

2014年,腾讯总裁马化腾第一次公开提出“互联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趋势,“+”的是传统的各行各业^[5]。2015年,马化腾再次对“互联网+”进行界定,认为“互联网+”应该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变革各行业生产方式的工具。同年3月,阿里研究院推出的《“互联网+”研究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鲍娟,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王正青,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报告》对“互联网+”的内涵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强调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实现各行业的生态化、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和思维方式。同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是一种以技术推动各行业发展创新、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最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形态。

至此,关于“互联网+”的内涵,社会基本形成共识。教育领域的学者则以信息技术与教育两个维度为核心,从不同角度对“互联网+教育”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王磊等人认为,“互联网+教育”是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的一种新型教育,是“建立在现代电子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的教育,它以学习者为主体,学生和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之间主要运用多种媒体和多种交互手段进行系统教育和通信联系”^[6]。吴南中认为,“互联网+教育”是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将教育注入互联网基因,实施从人才培养目的、人才培养过程到人才培养评价等全程的变革,它以支撑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变化为基础,以培养满足互联网经济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为目标^[7]。关于“互联网+教育”的核心内容,2015年5月24日,中国教育信息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CEIIA)专门举办会议,围绕“互联网+”时代,对教育的输出和输入模式、教学模式以及教育平台建设管理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综上,所谓“互联网+教育”,即是在教育的各要素中,包括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以及教学评价等,融入信息技术元素,最终形成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整合的教育新形态。其中需特别指出的是,“互联网+教育”中的“互联网”与“教育”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嵌套、融合的关系。“互联网+教育”的目的不是用技术替代教育,而是通过技术促进人的发展。技术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思维方式。

二、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教育”时代,互联网本身具有的自动化、数字化以及免费化等特点促进了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融合,教育的核心维度如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学业评价等,较传统的教育模式而言,出现了颠覆性的创新,随之催生了世界教育的新形态。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以国际化视野为研究取向的重要分支,在迎来时代赋予的新使命的同时,也于机遇与挑战中迎来了学科的蓬勃发展。

(一)政策支持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2015年5月21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通过了以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为主要目标的《仁川宣言》,随后推出的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着重提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要透明化、实行问责制,同时强调民主参与。它们共同为未来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月,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教育部合作举办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上,与会者主要围绕重塑教育制度、信息技术创新运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政策等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的重要成果是签署了题为“抓住数字化机遇、引领教育转型”的《青岛宣言》,该宣言为各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政府的顶层设计下,协同多方推进教育的创新发展,坚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以推动“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主要目标开展各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行动计划,教育信息化成为国家战略,教育信息化工作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创新发展”^[8]。《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也明确提出,要提高数字资源的公共服务力度与应用,致力于研发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示范性推广项目与活动,争取完成全国1000万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任务^[4]。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政府的政策支持则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对教育与信息技术融合的高度重视,为比较教育学科在“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二)技术创新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教育资源缺乏一直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使在教育高度发达的美国,也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买不起他们所需要的课本。”^[9]因此,“互联网+”时代,数字课本的使用必将是大势所趋。由此,数字教育资源的免费、开放获取显得至关重要,信息技术成为信息获取的重要制约力量。MOOCS(慕课)是一个很好的在线课程创新模式,但其大部分课程虽然是免费的,教育资源却并不完全开放。所谓“开放资源”,是指资源获取的免费化、自由化、人性化,获取的资源能够合法下载、译成各种语言以及可以根据地区情况作出修改,以适应本地学习者的学习需要。近15年以来,教育资源,包括课本、课程、学位项目等,以及用来传授读写、学习物理化学、学习批判性思维的大部分学习工具,基本都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意味着,如今在互联网、磁盘空间和云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零成本地存储、复制数字文件,最终推动数字化时代教育的发展。

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和免费获取是“互联网+教育”的基本特点。目前,互联网上共有约13亿知识共享许可作品,这些共享资源包括图片、电影、政府数据、教育资源、博物馆和档案等^[9]。2012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召开的世界开放式教育资源大会,发表了开放式教育资源宣言(Open Education Resource, OER),“宣言”支持并鼓励世界教育资源的开放、免费获取。OER一词于200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有关开放式课件的论坛上首次提出,指“以各种媒介(数字化或其他形式)为载体的教学材料和研究材料能在共有领域提供,或以开放式许可的形式提供,不加限制或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地允许他人免费获取、使用”^[10]。目前,麻省理工学院(MIT)将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发布在网上,供需要者免费获取。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数百所大学效仿了这一做法。在我国,为了使更多公众享受“互联网+教育”带来的丰富资源,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有6.4万个教学点全面完成了“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建设任务,实现了设备配置、资源配送和教学应用“三到位”^[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为了更好地服务世界教育,向世界各国提供及时的教育数据资源,在数据获取途径上进行了不断创新。如“打开”了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数据库,打破了数据、分析报告、数据视图讲述和其他工具间原有的信息孤岛局面,从而在为探索和利用UIS数据提供无缝接入途径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获取丰富的教育资源创造了条件。

海量教育资源的开放、免费获取,为各国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在庞大的教育数据中挖掘、分析有价值的信息。但“互联网+教育”时代出现的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如Tableau、Quickview、Cite space等,把技术和教育整合在一起,解决了数据分析的难题。研究者学会软件操作后,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查询和生成各国、各地区的教育数据直观动态图,然后再通过相关的文本分析技术,以及Yun Table等具有深度挖掘数据和分析功能的软件,对既有的可视化图表进行深入挖掘,并加以质性分析,从而揭露出潜在的教育问题。由此可见,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不仅能对教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还能就分析出的数据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科学的预测,而这正契合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因而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驱动力量。

(三)学科内在生命力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持续增长点

比较教育学自诞生以来,因没有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过于宽泛以及缺乏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等,其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一直饱受质疑。但时至今日,比较教育学仍能够立足并呈蓬勃发展之势,恰缘于其强大的学科内在生命力。不仅是比较教育领域的学者对比较教育学学科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过探索,教育领域的其他学者也从外学科的角度证明了比较教育学存在的必要性,如学者林

海亮就从科学学的角度分析了比较教育的未来发展,认为比较教育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将引起一场科学革命,迎来学科的繁荣时代^[12]。

在互联网时代,技术的创新使用户不仅能免费、开放获取教育资源,还能运用翻译软件将其翻译成各国语言,这使得比较教育学者的传统优势如语言优势等,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正是在教育资源海量化、类聚化的“互联网+教育”时代,比较教育的独特优势再得以彰显。正如前文所述,比较教育学是一门具有国际比较视野的学科,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比较教育学者独具的比较性思维将成为本学科的立足之基。此外,比较教育“研究无边界”的特点与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也正好契合。在海量数据中,利用信息技术挖掘出有用的教育信息是比较教育的使命,也是比较教育学者的研究优势。当前,PISA 测评风靡全球,其每一年的测评结果都会引发一次教育研究热潮,而这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国际性的比较视野,还要有挖掘数据背后教育意蕴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比较教育学者们基于长期、稳定的数据跟踪,基于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深入解读,形成了关于一国或国际教育数据的洞察力和解读力,这种对全球教育数据的洞察力及解读力将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优势^[13]。

三、“互联网+教育”时代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转型

“互联网+教育”催生了世界教育的新形态,在给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为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转型提供了新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体现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比较教育学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

(一)研究目的强调服务本国教育与推动世界教育发展并重

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个,即:借鉴国外教育制度,服务本国教育;探索教育一般规律,分析影响教育的各因素;增进国际教育理解。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贝雷迪(Bereday)指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比较教育这门学科的最终目标是探究使国际间的相互了解成为可能,并对学校与其服务对象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做出界定的‘规律’(laws)或‘类型’(typologies)。”^[14]目前,国内比较教育专业的学位论文选题中,多数仍然是围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探寻对我国教育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熊华军等根据齐普夫第二定律提取我国近十年的比较教育研究热点形成的可视化分析图显示,关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明显居多。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世界领先的教育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则在于语言问题。目前,国内学校所开设的外语课语种一般都为英语,这使得大部分研究者碍于语言,只能选择自己能看懂原文献的国家来开展研究。除了国别研究外,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还着眼于学科建设、国际教育主题,如教育公平、教育全球化等问题。

可视化工具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典型运用。通过可视化工具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国内外的教育研究热点,从而洞悉各国教育动态,并发挥比较教育学的专业优势挖掘有效的教育数据信息,进而在改善本国教育的同时,为世界教育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研究对象的跨时间性、跨空间性历来是比较教育学的特点,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去西方中心化”,实现“输出”与“输入”并重。如中国上海在 PISA 测评中取得让世界瞩目的成绩后,吸引了大量国外研究者来中国进行考察,并邀请中国教师为他们国家的教师开展培训,介绍中国教育成功的经验。从中可以看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已超越了国家疆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模式对发达国家而言也具有参考价值。“各民族的文化不是绝缘体,各国家的教育都是混血儿。文教交流古已有之,今后更甚。”^[15]因此,“互联网+教育”时代赋予比较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新使命应该是发展本国教育、推动世界教育。

(二)研究对象从“大国中心”转向“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并重

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主。比较教育从一开始就形

成了强烈的借鉴取向,比较教育研究者大多以引介和分析特定时代“理想社会”和“理想教育”为基本内容。“理想社会”通常是以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因此,这一研究取向及其由此形成的“理想社会的理想教育”假设,使人们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教育^[16]。不可否认,在某一时期,西方大国如美国的教育相对来说,的确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因而时至今日,国内对外国教育的研究仍然以美国等大国为主。从《外国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根据本刊文献关键词所得出的学术热点动态图可以直观看出,这两个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在国别研究上,仍然以美国、英国等大国为主。

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广,专业性、时代性强。在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的关注对象应“去大国中心化”,转向关注世界各国的教育问题。尤其在“互联网+教育”时代,万物互联,世界各国的教育犹如一个蜘蛛网上的各条蛛线,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教育的研究国家应从民族国家转向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各类国家。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组织和跨国教育合作越来越普遍,迈克·吉恩(Mc Ginn)认为,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以及类似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机构削减了“民族国家”概念,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17]。有数据显示,PISA 测试中的参与国和地区的数量从 2000 的 41 个增至 2015 年的 72 个,参评学生达到 54 万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数量也有所增加^①。这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共同走向了国际舞台。因此,在“互联网+教育”时代,研究对象“去大国中心化”应是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起点,落脚点则应是以世界教育和发展教育的研究为主,并重视本土化教育研究。

(三)研究方法强调“互联网+”背景下的比较性视野与思维

思辨性研究是教育学常用的方法,在迪尔凯姆(Durkheim)看来,人文社会学科使用比较的方法正如自然科学中使用实验的方法,是一种“间接的实验”。他说:“如果我们无法掌握事实产生的过程,我们就只能对其现有状态进行批判,这种方法就是间接实验法,或者叫做比较法。”^[18]比较教育研究在不同时期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借鉴时期的描述法到因素分析时代的因素分析法再到社会科学时代的实证研究法,这说明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而在这些多元方法的背后,始终渗透的是将“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种思维方式的观念,这正是比较教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把“比较”仅仅当做一种资料收集和分析工具的重要特征。

“互联网+”是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创新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方法论,是推动各行各业与其高度融合的新引擎,是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生态的先进信息技术平台^[19]。比较教育学者在“互联网+教育”时代除了综合运用已有的研究方法外,还应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思维层面的方法论来分析、挖掘数据。如利用 IBM、Oracle、SYBASE 等数据库产品收集数据,其中数据库的设计可根据比较教育研究的内容和需要来构建数据库表和字段,尽可能做到标准化和规范化。在类聚和处理上,可将海量的小数据库导入到大型的分布式数据库中,采用分布式技术对这些大数据进行分析,再用 Yun Table 等工具统计汇总,进行数据的深度挖掘。

“互联网+教育”时代,信息技术可视化工具的发展给比较教育学者带来研究便利的同时,也在可视化工具使用和数据挖掘方面给比较教育学者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大,需要比较教育学者用量化的研究方法,以思辨性的比较思维来分析教育现象。要最大限度地消除研究者基于个人主观偏见、价值立场和政治倾向等进行的教育研究,回归到以量化和数据分析为主要方式的客观性解释^[20]。

(四)着力培养胜任数据分析和国际教育交流的专业人才

如果说“互联网+”关注的是技术维度,那么“互联网+教育”则更多是关注人的维度。因此,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变革教育形态的重要环节。时代赋予比较教育学这

① 数据来源:OECD 电子图书馆(PISA-OECD iLibrary. http://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pisa_19963777.)

门学科的新使命就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兴技术,深入挖掘世界各国的教育信息,将教育数据的使用放到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进行数据的再修正。因此,“互联网+”时代,对比较教育学者进行数据工具使用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增强比较教育学学科自信,乃至改善我国教育、推动世界教育都大有裨益。

所谓“国际教育交流的专业人才”主要指符合国际组织,如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等的需要,且具备相关能力的人才。增加国内学者在国际组织中的占比,不仅能使比较教育学者掌握到更权威、更丰富的资源,还能提升国家话语权。联合国秘书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在联合国秘书处就职的工作人员共41237人,其中包括450名中国人,具有高级职位者11人^[21]。国际组织中人才比例不足对我国国际政治地位提升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国际组织中,所在国家人才比例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国际组织会议举办地的选择,而众所周知,举办国际会议,将为举办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以瑞士为例,2011年,在该国日内瓦召开和举办的国际组织会议达到2700场,与会人数达到198700名^[22]。国际会议的举办不仅提高了瑞士的国际知名度,还促进了瑞士与各国的交流,带动了瑞士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了瑞士国民的就业率。

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23]。因此,提高我国人才在国际组织中的比例,是比较教育学这门跨文化教育学科建设和增强学科自信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四、结 语

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比较教育学既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不仅要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还要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数据隐私、数据鸿沟和教育公平等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在网络信息泛滥的互联网时代,如何应对碎片化信息带来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也是比较教育学亟须思考的问题。比较教育学应具有显微镜功能和望远镜功能,既聚焦国内外教育动态,也描绘本国及世界教育发展蓝图。这就需要比较教育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实现学科的转型。尤其在人才培养上,应着力培养具有信息整合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使其能以主人翁意识为世界教育做贡献,能以客文化中的一员融入世界各国,增加对国际教育的理解,进而促进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转型,增强学科自信。

参考文献:

- [1] 王正青,唐晓玲.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动力逻辑与推进路径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7(1):94-99.
- [2]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DB/OL].[2017-05-27].http://www.gov.cn/premier/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 [3] 刘延东.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EB/OL].[2017-05-27].http://www.cac.gov.cn/2015-11/20/c_1117203757.htm.
- [4] 教育部关于印发《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的通知[EB/OL].[2017-05-27].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702/t20170221_296857.html.
- [5] 乔杉.20年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才刚开始[N].人民日报,2014-04-21(10).
- [6] 王磊,周冀.无边界:互联网+教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9-20.
- [7] 吴南中.“互联网+教育”内涵解析与推进机制研究[J].成人教育,2016(1):6-11.
- [8]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7-05-27].http://www.ict.edu.cn/laws/new/n20160617_34574.html.
- [9] Cable Green 主张所有公立教育资源实施开放许可[EB/OL].(2016-12-22)[2016-12-27].<http://zh.unesco.org/news/cable-greenzhu-zhang-suo-you-gong-li-jiao-yu-zi-yuan-shi-shi-kai-fang-xu-ke>.
- [10] ATKINS D E, BROWN J S, HAMMOND A L. A review of th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movement: Achievements,

-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M]. San Francisco Creative common, 2007;1-5.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EB/OL].(2015-03-15)[2016-12-15].<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87/201503/185165.html>.
- [12] 林海亮. 比较教育学学科形态分析——以科学学的分析框架论比较教育学身份危机[J]. 高教探索,2016(2):51-56.
- [13] 滕珺,大卫·特纳,吕云震.大数据与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新相对优势[J]. 比较教育研究,2015(11):16-22.
- [14] BEREDAY G Z F. 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M]. New York:Oxford & IBH Publishing Co.,1964:134.
- [15] 滕大春.试论比较教育和“洋为中用”[J]. 外国教育,1984(1):1-4.
- [16] 陈时见.论比较教育的学科属性与学科体系[J].比较教育研究,2008(6):1-7.
- [17] 唐晓玲,徐辉. 大数据时代的跨国比较研究与比较教育学学科转型[J]. 比较教育研究,2015(9):16-21.
- [18] DURKHEIM E,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M].Paris:PUF,Quadrige,1937:124.
- [19] 詹青龙,杨梦佳.“互联网+”视域下的创客教育 2.0 与智慧学习活动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2015(6):24-31.
- [20] 阎光才. 对英美等国家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取向之评析[J]. 教育研究,2014(2):137-143.
- [21] 滕珺,曲梅,朱晓玲,等. 国际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 ——联合国专门机构专业人才招聘标准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2014(10):788-4.
- [22] Feder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Some facts and fig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geneva[EB/OL].(2013-07-09)[2017-03-25].<http://www.e-da.admin.ch>,2013-07-09.
- [2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N]. 人民日报,2010-03-01(01).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BAO Juan,WANG Zhengq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education driven by innov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utilizes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of the Internet to integrate educ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dimension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disrup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of China not only obtains opportunities but also the discipline transform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erving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bjective has shifted from the “center of great power” to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center and edge countries. The research method emphasizes the comparative thinking and vision under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Talents training will focus on the ability of data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s.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subject challenges; subject transformation; discipline confidence

责任编辑 邓香蓉